

# 开罗会议前 蒋介石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与考虑

冯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摘要:**开罗会议决定台湾战后命运,作为中国首脑,蒋介石在会上的主张至为关键。在此之前,他对台湾的认识有一发展过程,并非一成不变。学界仅选择蒋主张收回台湾的几次言论加以探讨,对其认识过程、策略选择的变化及个中原因缺乏考察。本文拟根据新史料,讨论开罗会议前蒋考虑台湾问题的脉络、对台湾的定位、应收复台湾地区区域范围的变化、收复策略等,对这一问题进行补充。

**关键词:**蒋介石;台湾收复;开罗会议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5-0022-06

关于蒋介石与台湾光复,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左双文《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关于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问题的一点补充》以及褚静涛《蒋介石与台湾收复》三文是为代表。关于开罗会议前,蒋介石对于台湾的考虑,左双文先生指出,1933年长城抗战后,国民政府对日立场渐趋强硬,这年3月和4月份,蒋介石两次讲话提到战后收回台湾问题;1938年4月,蒋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讲“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是国民党在正式场合明确提出要收复台湾且有文字可考的第一次<sup>[1]47-48</sup>。几年后,左双文先生复撰文补充论证,指出:1933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吾党之传统政策,乃在恢复朝鲜台湾等失地,以行王道于世界也。”该史料与徐永昌日记的记载互相印证,证明蒋在1930年代初就有对收复台湾十分明确的主张,而其形成此一民族革命立场的时间当在更早的时候<sup>[2]190</sup>。褚静涛先生提到,1925年7月,蒋

介石在黄埔军校提到过台湾,但并非对台湾未来地位的考虑;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蒋放弃“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其外交纲领,试图与列强和平谈判,尚不敢公开提及台湾问题;1934年4月,蒋在抗日浪潮高涨情势下,表示“台湾、琉球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旧有领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们手里收回”;1943年,蒋介石在日记与《中国之命运》等著作中论述对于战后收回台湾的规划<sup>[3]60-63</sup>。其他研究成果基本未脱以上说法。也就是说,现有研究认为,蒋介石于1930年代之前形成民族革命立场;1930年代,有对收回台湾明确的想法和公开讲话,但部分国民党高层对此将信将疑;1940年代,收复台湾成为国民党高层共识和纷纷公开宣讲的目标。这一脉络虽已基本清晰,但蒋介石对于台湾的定位其实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点却为前人的研究所忽略,加上近年来又有新的史料开放,故笔者拟对这一问题进行补充和再讨论。

收稿日期:2014-12-30

基金项目:该稿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冯琳(1977—),女,河南郑州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台湾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台湾政治史、国民党史。

## 一 开罗会议前蒋介石对台湾问题的认识脉络

1926年以前,蒋介石在崛起之中,尚未具备指点江山的能力,没有认真考虑过许多外交方略之类的问题。

1926年7月,为完成孙中山遗愿、结束军阀割据,蒋率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直到1928年完成形式上的中国统一任务。北伐期间,蒋介石开始面对越来越多涉外事务,与武汉国民党中央争夺外交主导权的斗争亦逐渐展开,这使蒋需要对各国关系进行定位,思考具体的外交策略,并对外发表意见。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前,蒋对外关系的定位是:专对英国,不牵动他国;对日联络,且有所期待<sup>[4]92</sup>。邵元冲、郭泰祺等人曾向蒋建议:对帝国主义各个击破,目下应集中反英,日本欲与英人竞长江商务,颇对我表示好意,“宜与之有相当联络”<sup>[5]287</sup>。持这种亲日观点的,在当时国民党内不乏其人。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初,蒋介石确也派人向日本传递信息,争取支持;而日本方面亦有笼络蒋介石之举,并推动蒋反共。1927年1月20日,蒋甚至派吴铁城代表自己秘密赴日,向币原外相担保中国人永不反日<sup>[4]97</sup>。1927年3月,蒋介石往访山本条太郎,表示:“日本如欲与中国亲善,须从根本上着手,即对高丽、台湾,应许其独立,诚能扶助弱小民族独立,则岂特中华民族一国对日亲善而已哉。”<sup>[6]1927年3月11日</sup>时值日蒋关系亲近友好之际,没有大规模战争迹象,蒋未曾想过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而且,此时蒋对台湾、朝鲜的历史似乎不甚清楚,有将二者视为一类的倾向,至少在对日本政客的表达中有混为一谈之误。可见,1926、1927年间,蒋没有公开谈及台湾问题,主要是时势使然。

1928年,中国才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外交重心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晚清时代丧失的权益,且未与日本发生严重冲突,因此没有公开提出收复台湾,但蒋介石脑中已有一些“大国领袖”的意识,有“扶助弱小民族独立”的想法,台湾问题已进入其视线。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推进,蒋开始有收复台湾之念。1932年9月13日与18日,蒋介石预定1942年中秋节以前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sup>[6]1940年9月30日</sup>。1940年代,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对战后收复台湾的问题考虑更多,不仅流于口头或笔端,而且有了更为具体的操作性对策,并有一定外交策略的运用;虽然其中的某些想法

不尽正确,但不妨碍收复台湾大局。1942年前后,国民政府空军曾对台湾与越南日军进行轰炸,蒋认为:“越南台湾本皆非国外,为我藩耳。”<sup>[6]1942年1月24日 上星期反省录</sup>此时,蒋对在台湾的作战视为中国份内之事。

随着二战局势日益明朗,蒋介石表现出更多的主权关怀和收复失地决心。1942年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国耻日,蒋在日记中铭记国耻:“四十七年前之今日,乃马关条约,割我台湾与让与倭寇之日也,亦即时辽东半岛被割之日,后因由三国干涉而归还,但我东北之沦陷实始于此日也,从此则缅甸亦被英强占矣,是年为我八岁,而国耻大难即蒙于此童昏之时矣。”<sup>[6]1942年4月17日</sup>此后,收复台湾的想法,在蒋的日记中有更为频繁的表述。在与美国的沟通中,台湾应交还中国这一要求多次被明确提出。此时,恢复国土的概念在蒋介石意念中有压倒一切的体现,台湾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理应归还中国,这是首要的问题。蒋言:“此时我国只求于实际无损,战后能恢复台湾,东三省与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sup>[6]1943年1月29日</sup>

战时台湾、旅顺等重要港口为日所占,因军港对战争起到重要作用,为加强防守,1943年1月,蒋介石考虑给予美国军港使用权,希望美国协助防御<sup>[6]1942年10月6日</sup>。

开罗会议前,蒋介石认识到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琉球为一王国,其地位与朝鲜相同,故决定在几天后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会谈中对于琉球问题不予提出<sup>[6]1943年11月15日</sup>。开罗会议中,蒋介石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作为主要目标之一进行接洽,并最终在会后的宣言中获美英共同声明支持,宣称台湾归还中国。会后,蒋介石感叹:“东三省与台湾澎湖岛为已经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何等大事,何等提安,何等希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sup>[6]1943年11月30日 上星期反省录</sup>

由上可知,蒋介石对台湾地位的认识及应收复范围的提法,前后是有变化的。1927年前后,将台湾、朝鲜视同一类。1930年代,蒋认为要收复台湾、琉球。1942年前后,认为越南、台湾皆非国外,“为我藩耳”。1943年开罗会议前,认识到琉球与台湾

地位不同,而放弃收回琉球之说,改为要求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在几次对台湾问题的论述中,蒋介石曾将台湾与朝鲜、琉球、越南混为一谈,从中可以推测,在一定时期,蒋对台湾的历史不是很清楚,对台湾的定位有失模糊,有与历史上中国周边朝贡国混淆的倾向。

## 二 蒋对台湾定位及应收复范围提法改变之原因

事实上,台湾与朝鲜、琉球、越南几地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而其它几地则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朝贡国。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有关于台湾的文字记载,证明台湾在那时已与大陆发生商业往来,甚至存在纳贡等政治隶属关系。宋元时期,中国在台湾设置政治机构,并驻防。宋代政府开始在澎湖派兵驻守,分屯、编户管理,实行屯垦制。1335年,元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台澎地区被正式纳入元朝版图。明代,台澎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海防前沿,后来虽有短暂的荷据时代,但中国政府始终认定台湾是中国领土。永历十六年(1662),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1885年,清廷在台湾建省,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积极推行新政,加快台湾发展。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中日之战战败而被迫割让台湾予日本,台湾才成为日本殖民地。而朝鲜、越南、琉球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国。相对于曾与中国有过朝贡关系的其它国家而言,朝鲜、越南、琉球与中国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其朝贡时间长,政治关系密切,经济交往频繁,文化上受中国影响也更大,最易与作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台湾发生混淆。

1920年代,在与日本的接近过程中,蒋介石对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台湾地位的考虑是劝说日本允许两地独立。此时蒋对台湾主张的立场仅是出于大国关怀与儒家道义,对台湾历史地位缺乏正确认识,将其等同于朝鲜。或者,即便蒋对台湾历史有所了解,但由于不具备收复失地的条件,只得将其与朝鲜归于一类,希望日本放松对两地的控制,使其独立。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局部抗战开始。随着淞沪抗战的爆发,中国日益扩大对日作战规模。为鼓舞士气,安定民心,蒋介石开始表示要收复台湾、琉球。此时蒋认识到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应予收回,但在其观念中,台湾与琉球是一样的。

抗战后期,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政府也

派遣军队在大陆之外的日本占领区作战,以统筹规划军事部署,影响英美“先欧后亚”政策。除1941年底中国远征军赴缅甸进行长达三年的作战之外,对越南、台湾等地日军亦曾派空军进行轰炸,蒋介石在记述此事时称台湾越南“本皆非国外,为我藩耳”,亦表明蒋对“藩属国”概念之模糊。蒋介石意识中不但带有“兴灭继绝”的儒家大义,还有侠义精神与领导亚洲弱小民族独立的大国思想;他将“藩”视同本国,与其说是觊觎别国领土的野心,不如说是“兄弟”意气使然。基于此,近代以来,蒋始终以扶助朝鲜、越南等国民族独立为当然之责任,除了希望与自己站在同一立场一致反共外,并未有其它图谋。1942年前后,蒋介石依然未对台湾地位有清楚界定。

1943年开罗会议前,蒋介石放弃对琉球的主张,认为琉球与台湾地位不同:琉球与台湾地位是有一定差异,中国在琉球不曾有直接的行政管辖,而仅有长达数百年的册封与藩属朝贡关系。行前,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为蒋准备的提案中提出日本应归还琉球群岛(或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sup>[7]499</sup>。但为“安美国之心”<sup>①</sup>,基于琉球与台湾历史地位不同,开罗会议前,蒋介石决定不主张收回琉球。在蒋、罗会谈中,罗斯福再三询问中国是否要求琉球群岛,蒋介石称愿同美国共同占领,并根据托管制度与美国共同管理该地<sup>[8]324</sup>。蒋认为,此区由美国共管比归我专有为妥<sup>[9]439</sup>。对于此点,不少研究者深以为憾。笔者认为,在当时历史背景之下,蒋介石退而求稳的心理亦有可理解之处<sup>②</sup>。

在开罗会议的讨论中,蒋介石在台湾之外特别将澎湖群岛提出,应为蒋介石幕僚根据割让台湾之《马关条约》的具体内容而提出的建议<sup>[10]48</sup>。《马关条约》第二款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以及“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治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三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并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sup>[11]270</sup>。按:依据《马关条约》,澎湖与台湾本岛一同被割让给日本,设澎湖岛厅(1897年改称澎湖厅)。为参加开罗会议,蒋介石令各部门准备会议方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的提案中关于政治问题的提案第六条提出,日本应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两处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与中国<sup>[7]499</sup>。此前的考虑与说法仅表明蒋介石大的意向与决心,开罗会议时根据幕僚研议方

案加上澎湖群岛更具外交可行性与针对性。因而，在最后的定稿中，中方代表王宠惠将原稿中的“在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特别是包括满洲和台湾，归还中国”一句文字，改为“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sup>[7]532</sup>。

退而求稳，根据条约内容，要求收复失地，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时最终选择的立场。太平洋战争到开罗会议期间，美国卷入二战，为牵制日军而扶助蒋介石走向大国席位。“不让美国为难”是蒋介石此期较为突出的一个心理，这在日记中多有体现<sup>[6]1941年12月5日,1943年8月25日</sup>。

### 三 收复台湾的策略

1942年10月，蒋曾考虑中美共同使用台湾、旅顺军港<sup>[6]1942年10月6日</sup>。1943年8月，在向美提出此点后，蒋介石又担心战后准予美国共同使用台湾与旅顺之海空军根据地之表示似乎为时过早，使美国了解中国对彼有所希望，即以为有所挟制，“反不以我国之交涉在意也”；虽有悔意，但为向美国表明中国没有野心，并杜绝美国与英、俄预谋共管台湾的想法，蒋感到还是应该自己先提出来，只要有协定或宣言规定以使用期限，便于中国无害<sup>[6]1943年8月25日</sup>。至于何时提出此说法，该日日记未予明言。但据1943年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补记：“去年夏妻与罗谈话要点：甲、东本省旅顺大连与台海琉球须归还中国，惟此等地方海空军根据地准许美国共同使用。”<sup>[6]1943年10月24日补记</sup>可知，早在1942年夏，蒋介石便有共同使用台湾之念。“共同使用”台湾的想法不是蒋的突发奇想，而是与其此时处境和心境有关。除希望通过此策略促使美国协助防御中国重要军港的想法之外，蒋还有其它考虑。

开罗会议之前，虽然蒋介石等党政要人在不同场合皆有对台湾主权收复的决心，但他们对台湾在战后的归属并不能保证。因为二战大局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英、美等大国，而英美通常奉行“先欧后亚”战略，以欧洲战场为主要着力点，忽视亚洲。蒋介石为此曾经颇为苦恼，数次劝诫罗斯福、邱吉尔要重视亚洲<sup>③</sup>。另一个令蒋苦恼而令台湾归属具有悬念之处，则是英、美对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没有足够的重视。鉴于中国近代以来为列强所欺侮的历史以及事实上的实力不济等原因，英、美对国民政府的轻视之心时有流露。抗战后期，蒋介石虽曾被抬至大国首

脑位置，却时而有不相称的“屈辱”之感，这种心态在1942年前后很是明显<sup>④</sup>。

为使台湾的回归得到确保，蒋介石曾考虑以在一定期限内由中美共同使用，来引起美国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投入。于是，1942年夏，蒋介石曾让夫人向罗斯福提出共同使用台湾的提议。此后，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并没有改变，蒋介石时有怨言。因而，在开罗会议之前，蒋介石曾至少两次向美谈到共同使用台湾问题。

对于旅顺港的共同使用提法，蒋介石也是抱有“赋予利益，使其积极”的想法。1941年12月，蒋曾与美国总统谈到：“渤海湾为亚洲惟一军港，当为中美海军合作之基地，故旅顺必使倭寇交还中国，方能消除东亚之祸根。”<sup>[6]1941年12月5日</sup>这一思路应是蒋介石曾一度考虑将台湾、旅顺供中美共同使用的出发点。

防止战后对台湾的国际共管之议，应是蒋介石曾经提出中美共同使用台湾的另一个考虑。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在战后不是顺理成章地归还中国，而是被设想出多种结局，这与上文所述的美国对国民政府缺乏足够重视和一定的敬畏之心是有关的。太平洋战争之后，对于盟军占领台湾后如何处置，美国有三种意见：台湾可独立和自治；归还中国；临时联军托管，托管期间台湾人民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他们最后的命运<sup>[12]20</sup>。1942年初，美国国防部远东战略小组的柯乔治（George Kerr）向军方提出的备忘录集中反映了这些观点，该备忘录用意甚明，台湾在经济与战略上对美国意义重大，不能“轻易将台湾交还中国人控制”<sup>[13]74</sup>。1943年8月，蒋介石向美提出战后中美共同使用台湾、旅顺时，防止美国预谋与英、俄共管台湾，便是其考虑之一<sup>[6]1943年8月25日</sup>。在坚定地要求台湾回归中国的同时，给美国以一定好处，并将防守责任绑在美国舰艇之上，抗拒其他有碍于中国领土统一的嘈杂之声，是为蒋介石的真实用意。

但是，据美国外交文件，在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向罗斯福谈到这个问题时，并未提到对台湾的共同使用。1943年11月23日晚餐，在商讨军事合作问题时，罗斯福提议，战后中美应作某些安排，遇外来侵略时，两国可相互支援，美国应在太平洋各基地保持足够兵力，以有效分担防止侵略的责任；蒋介石表示同意，希望美国给予中国必要军事援助，并主动提出中国准备将旅顺军港供中、美两国共同处置<sup>[8]324</sup>。开罗会议期间的会谈中，在商谈军事合作

问题时,蒋介石仅表示打算中美共同使用旅顺港,并未提到台湾。笔者尚未找到更多资料表明这一变化的原因以及蒋改变想法的确切时间。姑且推测:蒋在会议期间观察到美国对于战后台湾归还中国并无异议,此点立场并将以共同宣言公布,遂决定不再强调共同使用台湾之说。

二战中,美国虽更重欧洲战场,但东亚战局影响到整个战争局势,美国需要国民政府全力以赴牵制日军,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因此,在台湾光复前,尽管美国内部不乏“托管”之类的嘈杂之声,但美国政府最终的抉择是以大局为重,支持中国收复失土,顺理成章地与蒋介石达成共识:“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sup>[8]324</sup>当英国有意将原草案中的“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等,当然应归还中国”的文字,改为“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等,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的文字时,美国坚定支持中方意见,使英国不得不放弃其含糊其辞的说法<sup>[7]530-532</sup>。当然,不排除此种可能,即在开罗与美国首脑面对面的会谈过程中,蒋介石对美国立场有了更清楚和更确切的了解,相应调整对策,未再提共用台湾军港之说。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为充分调动苏联的积极性,美国

却又出卖中国利益,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表面上看,这与一、两年前开罗会议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宗旨相悖,实质却是一致的,均是大国利益至上外交原则之体现。同样具有嘲讽意味的是,美国内部主张台湾“托管”或“自治”的言论,在战后再次甚嚣尘上,否定不久前与中英两国的共同宣言,制造台湾与大陆的分隔,为中国政府造成困扰。

#### 四 结论

综上所述,蒋介石对于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一发展过程,其间不乏概念模糊的言论表述。主要原因还是国民政府对于收复台湾并无较早而充分的准备,蒋介石缺乏对台湾问题深有研究的幕僚。其结果不但造成领袖在较长时间内对于台湾历史地位缺乏准确定位和对具体问题的清晰考虑,也导致接收工作的混乱和流于表面。然而,这似乎也不能一味苛责前人远见不足。此点遗憾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国民政府和蒋自顾不暇的处境。无论如何,作为中华民国的领袖,在抗日战争以后,蒋介石是始终主张收回台湾的,这一立场并无改变。随着局势发展,蒋对台湾的定位日趋准确,主张日趋明朗,并在开罗会议时做出正确应对,使台湾的光复具备了法理基础,此点功绩应予肯定。

#### 注释:

- ①王海滨认为,二战结束前国民政府内对琉球的未来处理存在着诸多分歧,态度摇摆不定。蒋介石由于首次参加大国会议而有“受宠”之感,想以低调稳健“安美国之心”,在琉球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参见:王海滨《中国国民政府与琉球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第141页)。另,王建朗亦认为,蒋出席开罗会议,“并不像以往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积极”,“中国对开罗会议的准备及开罗会议中的会晤也采取了低姿态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方针”(参见: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55页)。
- ②有研究者认为蒋介石未在此时积极主张收回琉球致使中国失去取得琉球法理治权的机会,美国于1972年将此地交予日本控制,为当前钓鱼岛争端埋下隐患(如王海滨《中国国民政府与琉球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第139-150页)。也有人指出蒋在琉球问题上由坚持收回到提议托管的转变,主要还是基于中美关系与自身实力而做出的选择,但此种转变不代表蒋在琉球问题上的真正态度(侯中军《困中求变:1940年代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与实践》,《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57页)。
- ③如蒋介石1942年1月7日日记载:“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和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1月14日日记:“转移英美先德后倭之心理,应告其东亚战局果延长,则其殖民地必动摇,且必为倭军利用,则大局不堪问矣。”参见《蒋介石日记》各该日记录。
- ④如蒋介石在1942年1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记载:“反侵略阵线各国签订共同宣言,我国始列为世界四强之一,甚恐名不符实”,“受尽英美人员之侮辱”等语;1月7日日记:“英美皆对我军轻视”;1月31日日记:“英首相演就,甚觉英美对中国轻视之心理”;此外,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美国对中国的“视若无睹”,如1942年1月31日上星期反省录、1942年6月5日日记等。参见《蒋介石日记》各该日记录。

参考文献:

- [1]左双文.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J].历史研究,1996,(5).
- [2]左双文.关于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问题的一点补充[J].抗日战争研究,2005,(2).
- [3]褚静涛.蒋介石与台湾收复[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3).
- [4]左双文,高文胜.北伐出国后蒋介石的对外方略[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3).
- [5]邵元冲日记[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6]蒋介石日记(手稿)[Z].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 [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G].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0.
- [8]Roosevelt-Chiang Dinner Meeting, November 23, 1943[G]. Chinese Summary Record (Translation)// FRUS.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43. Washington: GPO, 1961.
- [9]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G].1978.
- [10]周小宁.《开罗宣言》拟定与发表的若干真相[J].军事历史,2013,(6).
- [11]弘治,张鑫典,孙大超.盛世之毁:甲午战争 110 年祭[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
- [12]柯乔治.被出卖的台湾[M].陈荣成等译.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
- [13]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 The Perspective and Consideration of Chiang Kai-shek to the Problem of Taiwan before Cairo Conference

FENG Lin

(Institution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The Cairo Conference decided Taiwan's post-war fate. As head of China, Chiang Kai-shek's proposal at the meeting was crucial. Prior to this, his opinion about Taiwan had a development process instead of being immutable and frozen. The academic circles only chose Chiang's several speeches which claimed to take back Taiwan to discuss, while there was short of inspection on the process of view, strategy choice, changes and the reasons. According to new historical data, the article prepares to add something to the problem, by discussing Chiang's sequence of thought on Taiwan problem before the Cairo Conference, orientation of Taiwan, the changes of Taiwan region scope which should be restored, and the strategies.

**Key words:** Chiang Kai-shek; Taiwan restoration; Cairo Conference

[责任编辑:凌兴珍]